

哲里木盟历史学会
第一届年会论文选



1979

C53

C53
399

399

哲里木盟历史学会

第一届年会论文选

1979

前 言

哲里木盟历史学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成立，同年十二月，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这是哲盟历史界在粉碎“四人帮”后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研究空前活跃的表现，也是建国三十年来哲盟历史学界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结果。哲里木盟历史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届年会，并为年会提出了较好的论文和报告。

我们现在编选了一部分论文，印成专册。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作者新近研究的成果，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现代史、考古学、民族史和历史教学法等方面。有的文章或译著的选题较新，有的文章则具有鲜明的地方史的特色，还有的文章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

我们编印这个论文选集，目的在于反映哲盟史学工作者最近时期的研究成果，检阅和总结我们的工作。我们计划以此作为起点，今后每一届年会都要编印一册论文选集。如同人们走路一步一个脚印一样，论文选集就是历史学会给自己留下的“足迹”。

我们还是首次编印论文选集，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哲里木盟历史学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冲破禁区，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魏 贤 (1)
略论汉初的“黄老”政治·····	李新华 (9)
《南史》、《北史》散论·····	瞿林东 (21)
关于评价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	庄竺华 (37)
“八七会议”初探·····	林 生 (58)
清固龙雍穆长公主墓·····	张柏忠 (72)
嘎达梅林传略·····	特古斯 王 坤 (96)
古典史学史概述·····	刘文鹏译 (14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英美三国关系简论·····	姜桂石 (158)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减轻学生负担的几点尝试·····	白 晶 (175)
关于中共党史的若干问题的情况介绍·····	傅朝荣 (181)

冲破禁区，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魏 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国范围展开的这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关键就是冲破被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解放思想，彻底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林彪、“四人帮”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设置了种种禁区，史学领域也是一个森严的禁区。在这个禁区内，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林彪、“四人帮”网罗一批御用文人，象梁效，罗斯鼎之流，秉承其主子旨意，利用历史进行反党活动，大搞主观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把一部历史篡改得面目皆非甚至到颠倒黑白的程度，搞得混乱不堪。对史学界流毒甚广，危害极深。事之今日，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史学工作者当务之急。我是一个中学历史教员，虽非专职研究历史，但十年中所见所闻，感受较深，愿借此文谈几点看法，以求教于同人。

(一)

林彪、“四人帮”出于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可以不择手段，在各个方面，各种领域大搞其反党活动，全面推行

其极左路线。借用史学这一领域进行反党，也是其别出心裁的一招。梁效、罗斯鼎之流为了迎合其主子旨意，不仅搞了一阵“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大讲特讲“儒法斗争史”，还连篇累牍地抛出许多所谓批判“尊儒反法”的奇文怪篇，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研究历史吗？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狂吠“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把他们自诩为“现代法家”，“要继承历史上的法家路线”，于是矛头所向，疯狂的叫嚣要批“现代大儒”特别是“党内的大儒”，恶毒的攻击陷害周总理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又搞了一出“评讲水浒”的丑剧，借机攻击陷害我们尊敬的邓付主席，大搞清君侧。林彪、“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罪行不胜枚举，罄竹难书。更为可恨的，为了大树特树自己，他们的御用文人秉承其主子旨意，竟堕落到不顾历史事实，蓄意歪曲篡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真是无耻之尤。他们搞的那种林彪版的党史“四人帮”版的党史就是铁证。请看，井岗山会师就是突出的一例。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即：把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去，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由农村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原南昌起义的一小部分部队，离开广州北部到达湖南南部，发动了湘南十余县的“年关起义”，很快壮大了队伍，建立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经与湘、粤两省反革命军队多次作战后，根据党的指示退出了湘南，到井岗山与毛泽东同志所部会合。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原南昌起义的队伍二千人及湖南农民军八千人，打退反革命军队的拦阻，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队伍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次会师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林彪也在朱德同志率领的队伍中只不过是小小的连长，根本不起重要作用，何况他一度还过小差。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当了付主席，于是他的那帮御用文人便无耻地不顾历史事实，伪造历史，硬说是林彪率领了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把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会师，篡改为与林彪会师。更为尤甚，他们硬把朱德的扁担，说成是林彪的扁担。至于在井冈山时，林彪曾一度动摇，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从历史上消迹了。为了掩盖事实，他们生拉硬扯地找出点理论根据，就大肆鼓吹“要突出林付主席，方针是参考历史，重在为现实服务”。说得清楚，因为“现实”是林彪当了付主席，所以“要突出”，这就把那当时连长的林彪“突出”到军长朱德同志之上，理由即“方针是参考历史”这就是“历史为现实服务”，也就是“立足现实，追溯历史”。正是欲盖弥彰，掩耳盗铃，取偷天换日之功，着实无耻之尤。更尤甚者，把林彪打扮成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最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代表”。说穿了，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手法。目的就是“突出”林彪，为他树碑立传，为他篡党夺权奠基。

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党所领导的十年内战时期的文化反“围剿”。我党领导的左翼文化队伍，在文学、戏剧、

电影、音乐、美术、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新闻、出版各方面，都击败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围剿”，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出于其篡党夺权的需要，借文化大革命之机，首先从文化、教育开刀，所以歪曲历史，把“三十年代文艺”全盘否定，定为“黑线”，把曾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左翼文艺工作者统统列为“黑线人物”，把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列为“毒草”。于是帽子、棒子齐下，什么“投降文学”、“叛徒文艺”、卖国戏剧”等等……，简直比作为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了。而恰恰把那两个寡廉鲜耻，坏事做绝的叛徒江青和特务张春桥却打扮成“三十年代的英雄”，除了鲁迅以外的唯一“左派”。颠倒黑白，一至于此，真是无耻之尤。这岂不是那种“突出”，“为现实服务”的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翻版吗？两路货色，同出一辙。为了给“四人帮”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可以为所欲为地篡改、伪造历史，历史的科学性到哪里去了？在他们的笔下，历史成了骗人的东西，这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任意歪曲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把历史作为反党的工具，为所欲为，这不足为怪，完全是他们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反映在史学上就是唯心史观。他们就是英雄创造历史，英雄主宰世界论者。林彪曾经提出过“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他为什么要塞进“奴隶”这个时髦的字眼呢？难道他真的认为创造历史也有“奴隶”一份吗？不！如果赤裸裸地说“英雄创造

历史”，这不就等于剥掉了他所披的那件“最最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外衣吗？这不就要露出马脚，显出其阴谋家、野心家的嘴脸吗？在他的心目中，奴隶创造历史是假，英雄创造历史是真。所以他大谈特谈宫廷政变，念念不忘一个权字。认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了权就可以主宰世界。故而他疯狂地想篡权、想夺权。

“四人帮”和他是一丘之貉，一脉相传。江青醉心于当女皇，她以历史上武后自诩，甚至把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都抬出来，引经据典地为她当女皇说教。这些家伙想的是当权，念的是权经，搞的是权术，干的是夺权，他们是权力的忠顺信徒。所以他们视群众为“阿斗”、“群氓”，实行愚民政策，是地地道道的英雄创造历史论者。这种唯心史观支配着他们。他们逆历史而动，逆时代而动，终究被历史所唾弃，被时代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落个可耻的下场！

(二)

十年沧桑，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流毒，尚待彻底肃清；所设禁区，务需各个冲坏。我们有些研究历史、编写教材的同志，他们为了编写好历史而在日以继夜的勤勤恳恳地工作。遗憾的是在一些历史专著或历史教材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客观，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资料之处，在他们的笔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差错和混乱现象，这就给我们这些教历史的带来不少困难。切身之感，我不免想问一句：你们这样编了？叫我们怎样去讲呢？原因又何在呢？我不妨从中国现代史举出几例，谈一谈我们的苦

衷。

其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出席代表人数和所代表的党员人数，众说不一。有的记载是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五十七名党员；有的写的代表七十名党员；有的记载是参加大会的有十三名代表（包括包惠僧），究属哪对？模棱两可。特别是大多数著作中仅记载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等仅半数或不足半数的代表姓名，另外几名就无从查考，这给我们这些资料奇缺的教员带来了困难。如果学生问道：“老师！这几名代表都是谁啊？”岂不是让我们作难，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了吗？虽然象刘仁静后来成为托派，陈公博、周佛海等当了汉奸，张国涛当了特务，但还有李达、李汉俊呢？从尊重历史事实出发，这些人当时确是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参加大会的。这是历史事实，就应该有名字记载，因为你写的就是一九二一年，就是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不是写的以后的历史。如果一个人后来犯了错误，就必须前功尽弃，一笔抹煞，在历史上销声灭迹，那不就象“四人帮”的法规，一犯错误就打倒，“永世不得翻身”了吗？如果这样，那么窃国大盗袁世凯，媚外卖国的李鸿章，独夫民贼蒋介石，就更不能在历史上露名了。

其二，李大钊同志是在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但在一九七三年后的教材中，却见不到李大钊同志的名字及其事迹了。而变成是“以毛主席为代表”了。事实上，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毛泽东同志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一次来北京，因经济困难，后经

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和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同志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才接触到一些先进人物。由于领导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〇年初第二次来北京，使他有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自己回忆这段重要时刻的情形说：“在一九二〇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爱地搜寻一切那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见，毛泽东同志，两次去北京，正是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而那时的李大钊同志已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李大钊同志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马列主义的观点。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出版的《新年青》杂志上，他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著名的论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看法，以及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来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倾向。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开始，它给当时中国思想界，青年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这些就是以证明李大钊同志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杰出代表。更不是象“四人帮”所诬蔑的“民主派”了。

我仅举以上两例谈了一点看法，文中所涉及到的史料，是从别人的著作和文章中摘抄来的。因为我不是专搞历史研

究的，只是个照别人的本本教书的。故特为加以说明。至于中国现代史中需要探讨，开展辩论，澄清事实，弄清是非的问题还很多。更不用说一部中国古、近、现代史了。

任重而道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发展社会科学，特别是史学研究，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中国通史和党史，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关键在于需要一种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作为一个普通的历史教员，殷切希望史学家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我如婴儿嗷嗷待哺，更加期望史学领域百花盛开，争奇斗艳！

略论汉初的“黄老”政治

李新华

西汉初期，统治者在努力振兴封建经济，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推行的所谓“黄老”政治，即所谓“清静无为”的政治（亦称黄老之术、刑名之言或道家言），素为当时的封建史家所称道，亦为历来的史学家们所注目。本文作为一篇阅读《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的习作，试对汉初“黄老”政治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历史作用及阶级实质等有关问题，发表一点肤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各位前辈和老师。

（一）

据史书记载，齐相国曹参崇尚“黄老”，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开创了一代新风。

公元前二〇一年（高帝六年），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不久，就以谋反罪徙齐王韩信，更封长庶子刘肥为齐王，并任命平阳侯曹参为齐相国。曹参到任后，大会地方豪杰和知名的地主阶级政客，向他们请教治政方略。但是“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居然看不出谁的主张更好些。后来曹参终于找到了善治黄老之术的大师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采用了盖公的主张，推行

“黄老”政治，“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①“黄老”政治收到了突出的成效。应当指出：由于当时的齐国领有七十余城，是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大封国，并且曹参又是刘邦选定的第二任汉家相国，②所以“黄老”政治在齐国的成功，对于年轻的西汉政权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

公元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曹参代肖何任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约束”，同时选择郡国中木强敦厚，不好文辞而负有众望的官吏做他的丞相史，罢黜“言文刻深，欲务功名”的人，全面推行他在齐国实行过的“黄老”政治，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赞扬他说：“肖何为法，颯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③说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难免过分夸张；但曹参为相国时政治相对稳定，人民能够致力于生产事业，这是完全可能的。

后来，吕后擅权，诸元臣对王诸吕都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史称，惠帝、吕后的时候，老百姓刚刚脱离了连年战乱的灾难，“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惠帝悠闲，吕后临朝称制，治政不须朝议而天下安宁。由于极少使用刑罚，所以犯罪的人也很少。老百姓能够安心耕作，衣食逐渐丰足起来。④文帝“本好刑名之言”，⑤政治“俭约宽和”。⑥司马迁赞之为“仁政”，并说因此“天下怀安”。景帝继位后，“不任儒”，⑦政事多决于窦太后。因为太后“好黄老之言”，所以那些诋毁“黄老”政治的人都受到严厉打击。汉代史书对此毫不讳言：儒者辕固就因为诽谤“黄老”学说，竟被窦太后罚与野猪搏斗。⑧武帝初年的丞相魏其侯和太尉武安侯也是因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而被窦太后罢免

的。⑨

以上事实说明，汉初推行“黄老”政治始于曹参，在惠帝、吕后时成为正统思想，到文景之时臻于完备。

实际上，早在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夺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过程中，就在不断寻求新的统治方略。随着汉家地盘的扩大，特别是在打败项羽，翦除异姓王之后，已经初步确立了“黄老”政治的基调。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提及陆贾的政治思想。

陆贾堪称汉初“黄老”政治的一个重要思想奠基者。起初，刘邦只留意于金戈铁马，一心夺取农民战争的果实，对政治学说却不感兴趣。陆贾劝谏说：“您在马上能夺取天下，但是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刘邦听了这话才有所感悟。于是陆贾进一步引用商周以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生动地说明了“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的道理。刘邦深以为然。在打败项羽之后即令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因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⑩。

陆贾可以认为是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的一位理论家了。他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为什么呢？他例举了上古虞舜治天下时“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清静似无治国之心，悠闲似无虑天下之事，然而天下大治。从而陆贾得出结论说：“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

⑩这就是劝说封建统治者不要碌碌于有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要相安无事，才能大治。这一点与道家学说中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是基本吻合的。后来的黄老学说拥护者司马谈在《六家要指》中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

并指出道家的学说以玄虚为根本，以纯任自然为原则。^⑫可以说是精炼地概括了这种“无为”的思想。陆贾又说过这样的话：处理事情要依据事情本身的具体情况，就象读书的人不一定必读孔夫子的，也象病人吃的药不一定必须是扁鹊开的方子一样，“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⑬司马谈也褒奖这种变通的思想。他赞赏“黄老”政治没有陈固的格局，没有一成不变的框框，所以能体察一切事物的规律。不被事物所左右，“故能为万物主”。它的法度的有无，主要是顺应着时间与事物的变化而起着发展与扬弃的作用。因此说“圣人不朽，时变是守。”^⑭这种变通的思想要求统治者依据具体情况确定统治方略，从而彻底摒弃了先秦道家学派主张尊古、复古和泥古的保守思想。陆贾还主张宽缓刑罚，不要役民过众，避免象秦始皇那样“讨乱于外”、“浩治于内”，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以防止人民的反抗。^⑮

曹参的治政原则正是体现了陆贾所阐发的政治思想。他告诫后任齐相说：“你不要穷治刑狱和商贾，而应当让那些易做祸乱的人不至于（被迫）造反。”^⑯在曹参就任汉家相国以后，惠帝责怪他不究政事。曹参认为：“高祖与肖何定天下，法令已经很明确了。现在，皇帝可以垂衣拱手，而丞相以下官员只须守职勿失，就很好了”。^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参的“无为”政治中还包涵了“无苛为”和“无妄为”的思想。

很明显，汉初的“黄老”政治，并非先秦道家学说的简单继承，而用司马谈的话来说，则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

事。”即依据变通的思想，采择道家学说中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之说，兼收诸子百家合于时事之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就是汉初“黄老”政治的思想继承性。

(二)

在汉初推行“黄老”政治这一历史事实中，是否包含了历史的必然性呢？

应当承认，我们首先得到的是它的历史偶然性：秦王朝实行了“暴政”，而汉王朝在窦太后死去不久，汉武帝便大兴“奢侈之旅”，“独尊儒术”，“内兴功业，外攘夷狄。”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呢？

我们认为，“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⑮也就是说，这种历史的偶然性正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汉初“黄老”政治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内在原因和历史背景，是当时的社会存在、首先是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除去“汉承秦制”^⑯这种对已有的社会思想材料的继承以外，主要还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实行“黄老”政治，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汉初经济凋敝，民不堪命。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丈夫从军，老弱转粮饷”，虽然是皇帝也坐不上青一色的四马车，大臣甚至坐牛车。^⑰农民失去土地，天下饥荒。“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⑱秦统治时户口有三万多的曲逆城，汉初只剩五千户。^⑲秦统治时就已经“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了，经过连年征伐，社会经济的残破不堪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迫切性是